

【建筑文化】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4.013

中国思想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

——基于文化—心理结构层面

李杨文昭¹, 柳肃¹, 唐经纬²

(1.湖南大学 建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2.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思想文化对建筑的影响包括具象性的继承, 如图腾、等级制度等, 同时也包括抽象的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塑造。而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塑造民族性格的关键, 其对古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分为空间构成、空间尺度方向性、想象空间三个方面。中国建筑精华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空间, 用文化—心理结构的构架来解答建筑, 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中国建筑的精髓, 也才能更好地设计出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建筑。

关键词: 文化—心理结构; 古建筑空间形态; 空间构成; 尺度方向性; 想象空间

中图分类号: TU-0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4-0070-08

“文化—心理结构”^{[1][10]}概念是由李泽厚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思想文化体系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原点, 而“文化—心理结构”是在文化的引导下民族发展至今所持续存在的一种心理结构, 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观察和看待事物的角度, 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认识或创造事物。于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下, 从内容到形式、从思维模式到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都能形成独立且承续的特点, 即所谓的民族特征。

建筑作为一种由人支配产生的固态不可移动的审美艺术, 建立了自身复杂的社会属性。建筑空间在作为一种社会劳动产物的同时, 更是一种固态感官型文化, 是“社会逻辑”的产物^{[2][18-23]}。而这种社会逻辑实际是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约束中形成的一定规律与社会偏好。因此对于建筑的民族性格, 究其根源, 自然与东方文化思想有重要联系。

文化对建筑的影响途径很多, 而当今建筑师很多都注重于其符号性的、具象的传承影响, 例如图纹的表现、习俗的传承或是等级制的色彩。然而笔者认为, “文化—心理结构”这一途径下产生的建筑空间形态, 才更能表现中国建筑的精髓。

文中所谓东方建筑空间形态并非以具体数据

衡量的具体时期的具体建构形态, 如斗拱或是色彩或是图腾, 而是一种经过时间变迁之后被不断强化的空间模式, 是概括的, 具有统一性。中国建筑并非如很多人认为的是一面山墙, 或是一个歇山顶, 更不是一个龙的浮雕这样的符号性建构元素。中国式建筑对于世界建筑最伟大的贡献便在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下形成的独特的空间模式, 对于其空间模式, 笔者归类为群构型空间构成、水平向的无限空间和可转化的想象空间。

一、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中国古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途径

李泽厚说: “所谓‘文化心理结构’, 归根究底, 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的特定状态”。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因素很多, 如思想文化传播, 自然环境的影响, 普通老百姓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 历代封建王朝的文教政策, 等等。而其中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则是很主要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进行思想层面的提炼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后, 通过游说、行为引导或者语言同化的过程, 熏陶着人们的思想, 巩固着某种思想文化的社会地位, 以至于

收稿日期: 2015-12-10

作者简介: 李杨文昭(1990-), 女,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 柳肃(1956-), 男,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E-mail: 1013848026@qq.com

使得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即“文化—心理结构”。

而在中国古建筑空间形态的塑造过程中，也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不同于地理、气候等直接且表象的影响，文化—心理结构很难被人认知，却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重大的作用力。

一方面，文人们的思想影响到社会的普遍认知，并以“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艺术认知与创作行为，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艺术，也

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理解思维，所以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古建筑空间形态。另一方面，文人思想文化引导下产生的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到文人建筑的空间形态，而这种古建筑空间形态由于从一个层面表达了中国思想文化，于是也被文人推崇与传扬，使这类空间形态在民间普遍存在，成就了中国的古建筑的空间特点（图1）。

无论何种方式，均不可忽略中国思想文化以文化—心理为媒介对中国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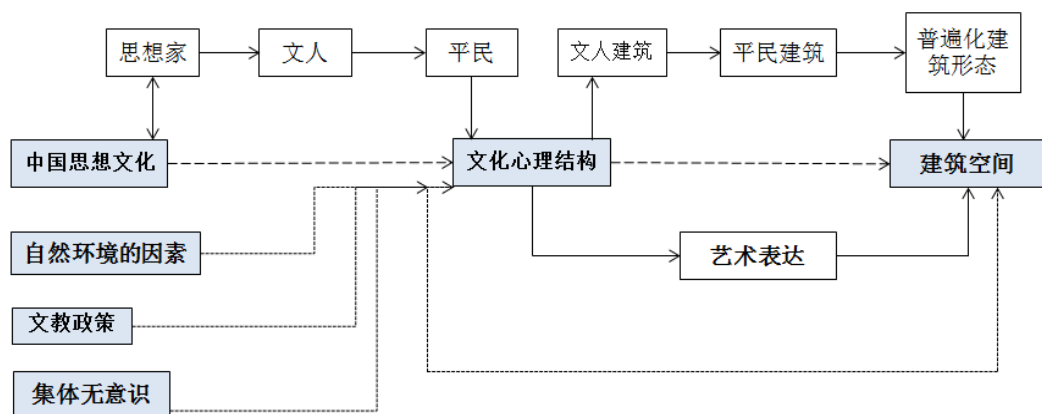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影响途径

二、对中国古建筑空间形态的影响内容

1. 对中国古建筑空间构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主要由儒、道、释构成。然而在对这三个派系的体系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各个派系均体现出一种对于“关系”的研究（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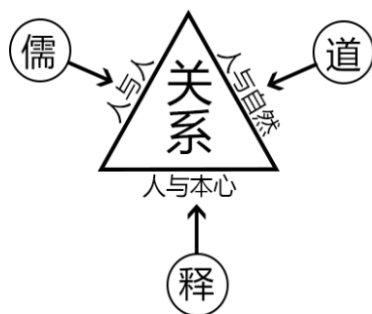


图2 思想文化体系对关系的研究

儒家文化，无论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中对“礼”的维护，还是“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与仁”后将“仁”推崇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仁”与“礼”实则特定历史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新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梳理与强化。其

关注于个体对于群体的适应，思考如何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

道家文化中，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运行法则，我们应该遵守自然规律。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并非源于道家文化，却在道家文化的宣扬中，不断被强化，巩固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等道家思想实质研究的是人与万物的关联，关于天地与我并生，自然与我合一。

释文化强调自解自立，重在“悟道”。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并不是视觉冲击的产物，而是一种个体感受，是一种人与本心交流后的感性飞越，实际就是追求人的肉体与心的一种融合。

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内在塑形下，中国艺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思维。其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强调主体与周边事物所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表情。格式塔心理学称之为“完形”，强调的是“由直觉活动组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3]223-225}。在这种

关系研究形成的视觉思维下,中国绘画艺术出现了独特的绘画技术——散点透视。

西方科学的透视学是一种单一时间、单一视角的视觉科学,从而使得主体尤为突出与醒目,而模糊周边联系体。而《清明上河图》中展示的中国独特的绘画技巧“散点透视”,却并没有表达的主体事物,所有故事平铺直叙,表达出来的不是某个特定事物的特点,而是将开封所有景色、所有不同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关系”的链接中形成对整体的理解。中国古代绘画技术无关乎科学,更多的却是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下的产物。于是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艺术家在事物的观察中,并非只有三种维度,更是联系了第四维度的时间与人们的心理时

空。散点透视中,主要表达的是视平面的交织,表达的是作者所感受到的世界,这其中贯穿了从思想文化到心理结构的一种全局性的概念。《易经》中提及的“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同样是对中国散点透视绘画作品的描述。这种不存在灭点的透视学,使视平面不断与另一个视平面交织。李晓东在《中国空间》中将其描述为:“视平面不断从一个到另一个部分将画面纵横‘编织’在一起,最终每一部分都引导下一个部分的出现并与其融洽,由此建立了连续多样的视平面。”“画面经由‘编织’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带有对时间和空间连续的显著认知”^{[4]50-77}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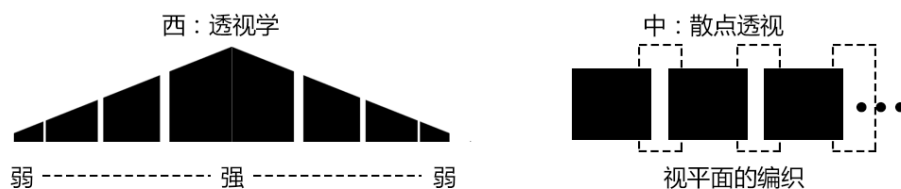


图3 绘画中的关联性

回归到建筑空间,在中西方建筑的比较过程中,我们发现,西方建筑以单个建筑的体量及立面造型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个体的突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便不断出现万神庙、圣彼得大教堂等经世传颂的佳作。其表达的是建筑的独立性与征服感及视觉的冲击力。然而建筑与绘画艺术不同,建筑空间的观赏与体验是一个带有时间维度的过程,随

着运动过程、空间环境的转换,建筑体验也会形成差异。因此,空间的设计更应注重“关系”的表达。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关系”的探讨,使得中国从思想家到文人再到普通民众,逐步巩固形成了一种对于事物间“关系”的认知。除了绘画等艺术表达,同样也映射在建筑的空间处理上。所以,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出现了独特的组群空间(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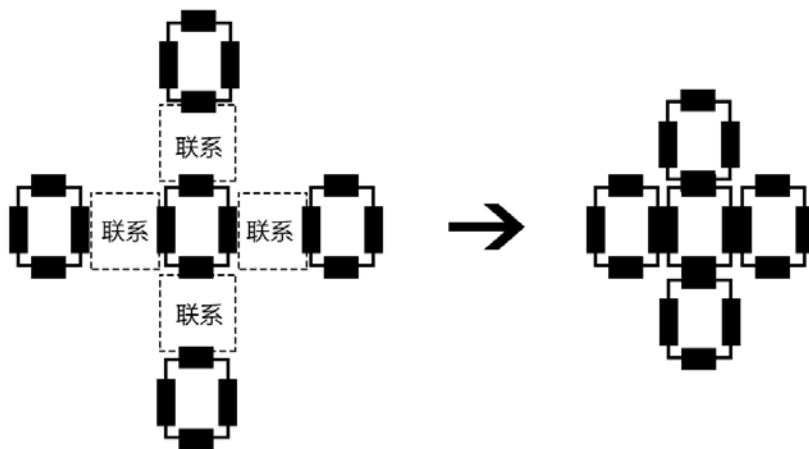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古建筑的关联性

中国传统建筑注重单体的组合,建筑单体与单体之间通过廊道或墙体联系形成院落,院落与院落

之间又可以组合联系,形成组群空间。程友玲在解析中国建筑的组群空间时,认为这种空间形式使人

与建成的环境形成互动，只有当人参与到空间中时，才能真正地认知整体建筑空间，因此其认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是整体设计的艺术”，其追求的不是单体建筑的形式，更多的在于群构后，建筑主体与背景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心理空间的感知的意境^{[5]223-225}。同时还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建筑灰白空之间的关系转换以及建筑室内外的体验空间的交叉。在这种不断转变的空间层次中，中国传统建筑如卷轴的散点透视的中国画一般，呈现一种可以不断连接不断生长的体系。正如格式塔所言“全体不等于它的部分之和”，这种联系性的整体艺术，展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关乎体验者内心情感的触动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进一步加固与承续。

总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关于“关系”探讨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中国民族的性格，以此影响艺术的表达，同时也深入到建筑空间的构成，形成了具有民族性格代表的群构型空间。

2. 对中国古建筑空间方向性的影响

西方思想文化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便推崇着一种“神人同形、神人同性”的思想，虽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探讨的却是神人的关系，弱化了真实存在的“自然”的地位，而之后的中世纪，更是形成了“罪感文化”。《圣经》中将人类的起源叙述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生下人类，从而被逐出乐园。其将人类的起源赋予了“原罪”的自我意识，人类在世间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成为一种赎罪的过程，人们将人生的信仰寄托在神的身上，形成了西方庞大的宗教体系。再到之后的文艺复兴，西方文化欲推翻这种罪感文化，却依旧无法摆脱古希腊、古罗马对于“神”、“人”的美感认知。因此，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中，我们提炼出一种“神 \geq 人 $>$ 自然”的关系。

而中国的哲学，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是“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1]25}。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礼”与“仁”的心理结构塑造，在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中，获得满足感。这一思想构架使一种强制的社会规定或是社会理想，转变为人的日常行为，将西方以宗教文化传递的东西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人的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为服从于人，服从于自己”。孔子

没有将人的情感引导到宗教上而是消融在人际关系中，因此，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西方宗教神学的作用，形成了中国所谓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与西方神学引导的“在赎罪中供奉上帝”的牺牲精神不同，中国人无论在困苦中的挣扎，幻想成仙，或是求神拜佛，都是为了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平安快乐。也就是在这种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虽然中国有很多文化派系与宗教形式，却都没有忽略人作为“人”的社会及自然属性。于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始终保持着“自然 \geq 人”的认知。

文化是意识的原点，在这两种差异性的文化体系下，中西方形成了差异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行为及思维意识方面。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艺术以希腊神话为培养皿，生长出各种以“神”为题材的艺术形象，“维纳斯”、“雅典娜女神像”等等，在“神人同形、神人同性”的心理结构引导下甚至影响到西方的建筑形式及类型。雅典卫城俨然成为了神的聚集地，西方古代建造者倾力建造出“万神庙”、“帕提隆神庙”、“伊瑞克神庙”等等，也产生了“多立克柱式”、“爱奥尼柱式”。他们以人的创造力来完善着对神的想象。而认识到“人”的社会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艺术表达，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以神为题材的绘画艺术居多的现象相比，中国绘画艺术常以山水画、人物画居多，中国艺术家不在于表达一种现实或者幻想中的事物的描述，而在于作品中蕴含的个人情感与精神，也渗透着一种对宇宙与社会的思考，让作者与读者建构出对某种人格情感的认知(图5)。

回到建筑空间上，建筑空间尺度是一种以体验感受为结论的建筑思维。于是设计者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感受空间，最后的空间尺度会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西方文化是一种人与神的关系的重塑，因此在西方艺术中不断以神为题材提醒着人与神的距离。而当艺术空间化为建筑后，设计师也不断在尺度上表达着“人与神”的交流，创造出的是—种竖向的尺度关系。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哥特式建筑，建造者不断追求结构技术，从普通穹顶拱、十字拱到帆拱，西方建筑在高度上不断创新，在建筑空间上达到与神的靠近。例如古罗马时期的万神庙，其

穹顶直径为 43.3 米,顶端高度达到 43.3 米,哥特式教堂代表科隆主教堂的中厅宽 12.6 米,高度为 46 米,亚眠主教堂中厅宽约 15 米,高达 43 米^[6]。其高度已然是现代高层建筑,却以一个通高的中厅空间呈现,这种超人的尺度下,较大的高径比,创造出神圣的光影效果,传达的信息便是人的渺小、上帝的控制力^[7]。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尺度,是一种水平向的尺度关系,相较西方建筑而言尺度也更加宜人。同样属于宗教建筑的佛光寺大

殿,面阔 34 米,进深 17.6 米,总高 16.5 米。中国建筑空间的尺度,不在于高度上的突破,而在于水平向的拓展与延伸(图 6)。即便是宋代建造技术发展而兴起的楼阁建筑,其主要用于登高望远及建筑群体的竖向点缀,而不是建筑本身的空间感知。中国传统古建筑注重点不在于建筑本身,而是在于人在其间行走的过程中,感受到人在流动性的这种空间氛围因子下的感受与体会。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空间是一种内向型的空间,是思维上的审美而不是视觉上的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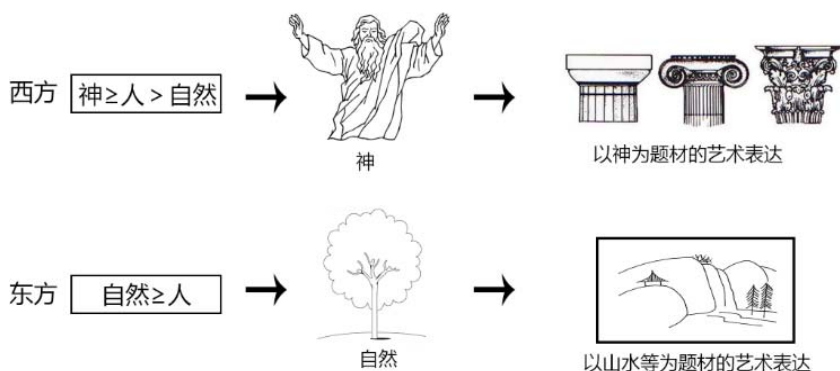


图5 中西方文化的自然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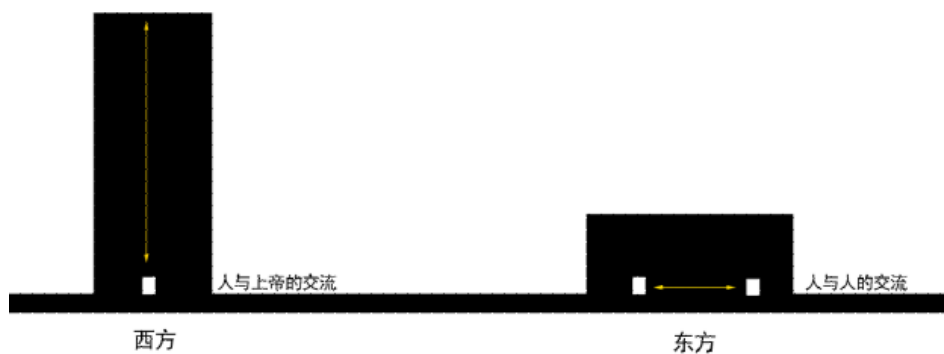


图6 中西方的建筑尺度观

在这种水平向的尺度体系中,中国的建筑形成了多变的围合形式。“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对于空间的描述解析了墙与空间的关系,围合半围合全开放,室内室外灰空间。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中国建筑空间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了“无限空间”的概念。布鲁诺·赛维说:“空间的本质是限定,建筑的本质……不因空间自由不止而受到材料的局限,而是通过这种限制的过程而被组织成为这种有意义的形式……这种限定决定视觉可能的界限,而不是在空处对视觉起的作用。”而

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艺术便是意识到限定与空间的关系,组织水平流动性的空间动线。有顶有墙是室,一面开敞是榭,有顶无墙是亭,无顶无墙的限定是台,在这些建筑空间的转换中,以群构的组织方式,创造出可不断生长的没有明显建筑与环境界限的“无限空间”(图 7)。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中对“人”的社会属性及自然属性的认识,使人摆脱了西方以神为情感起点及终点的宗教神学,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立的审美思维。这种审美思维,从学者到平民,在时间的轴轮中逐渐巩固成为了一种社会普

遍认知,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行为及艺术创造,而在传统建筑空间上也形成了水平向生长的空间

模式,与西方竖向型的与神对话的空间尺度模式相区别,创造了一种水平尺度上的无限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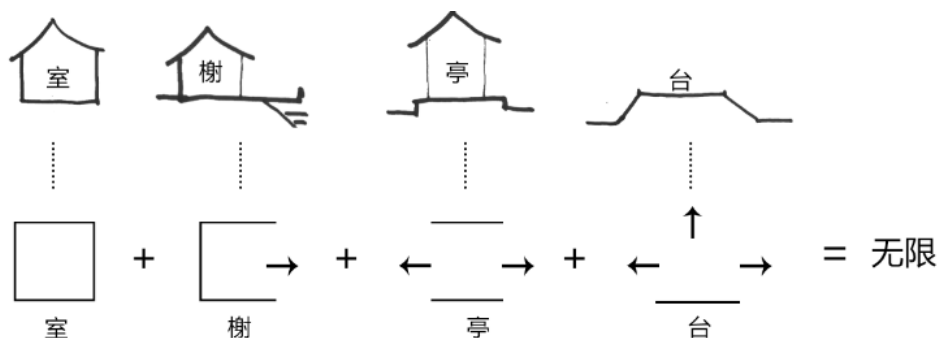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古建筑的水平方向性

3. 对中国古建筑空间的想象空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强烈地体现出“轻逻辑,重经验”的思想模式,然而《孙子兵法》中采取的却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是一种现实的观察分析,“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这便是道家的“辩证法”。中国的辩证法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老子》便发展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不仅在于社会斗争,更多在于宇宙与自然间的辩证法。所谓“反者道之动”,老子的哲学思想便是在描述运动中的对立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这种思辨的哲学,强调着对立项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结果。而这种哲学观,也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民族的审美视角及阅读创造思维,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引导下,中国的艺术及技术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审美艺术,更是思维艺术。水墨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其以黑白为主色调,创造出一种以写意为主的绘画方式。黄宾虹对于中国绘画的描述为:“中国画的奥秘就在太极图中。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全部的艺术规律都是辩证的。”^[8]水墨画的表现力,不仅在于作者如何呈现画面,更在于阅读者的阅读思维通过一定的辩证转化而想象完成的完整的画面。在这种黑白反向的墨色下,“无”与“有”的转换,成为作者与阅读者的绘画过程,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构建了

一种辩证转化的思维模式。因此在作者的引导下,形成了视觉到思维的转换,在思维上补充完成了绘画中未以具象描绘的事物。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说与“再现”的西方艺术不同,中国绘画是“表现”的艺术,重在写意,其实“写意”便是中国绘画中利用辩证的哲学观引导阅读者在思维层面上绘画的过程。如宋朝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图中只有一叶扁舟,未有一处笔墨来描绘江河,然而读者在阅读绘画的过程中却能感受到烟波浩渺,实际上这便是一种转化的过程。

再看中国建筑空间,实则是一副空间化的水墨画。其空间并不是一个视觉的冲击,而更注重于其体验的过程。空间体验者在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的感官冲击中,形成的想象空间也是中国建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如何构筑想象空间,古人运用的手法便如中国绘画一样是通过辩证的矛盾转化的思想。空间的“空”与围合的“实”看似对立,然而空间却需要由围合来创造,在这样的辩证思维中,古人在围合形式上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渗透,完成了建筑的哲学。现代设计师在仿古设计中常见引用传统建筑设计元素,如“月亮门”,然而却鲜有体会到月亮门的真正含义。传统中国建筑中月亮门的设计并不在于门的形式本身,而在于月亮门所产生的空间的渗透及转化过程。一面白墙创造“无”的背景底图,而月亮门的掏洞形式则创造出“有”的隐约可视的景观图。对比于完全封闭的白墙,月亮门创造的“有”的景观的渗透使得无景观空间更为生动;而对比完全开敞的全景观型空间,白墙的视觉阻挡加上月亮门的景观视觉渗透,却让人更有

前往景观空间的欲望(图8)。在这样的“有”与“无”的图底转换过程中,建造者带动的是空间体验者的思维体验及视觉欲望,创造出了更为动人的想象空

间,于是空间的体验成为了建筑者与空间体验者的思维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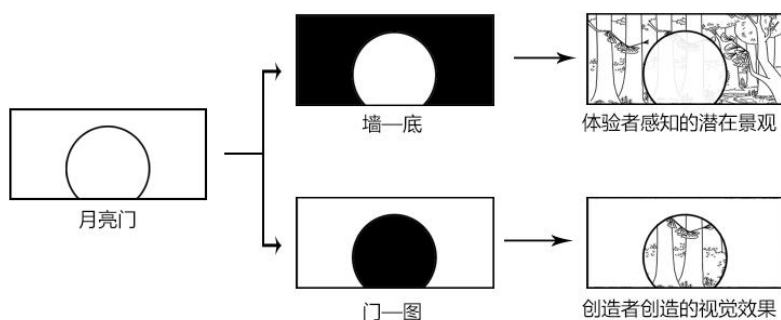


图8 月亮门的想象空间

辩证法的中国哲学丰富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及思维,于是在广受知识熏陶的文人社会中,中国艺术也逐渐表现出辩证法的艺术形式,而这种思想也在艺术以及传播中,逐渐深入平民却可能不被感知。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巩固过程中,从中国文人建筑到平民的建筑空间,不断被引用创造,构成具有辩证哲学的空间形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想象空间”。

三、结 论

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理论基础,在不同层面影响了民族的性格与面貌,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塑造是其最深层的影响力,作用力远大于图腾或习俗的传承,是一个民族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引导下,人们将思想反射成为行为及思维方式,从而形成民族的艺术,也成就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不在于视觉型的符号,而在于文化—心理结构塑形中创造的中国空间模式,包括了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对于“关系”探讨中影响形成的群构型中国空间;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可形成了与西方“竖向型”空间不同的“水平向”的无限空间;辩证法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的除实体空间外的想象空间。

当然,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具有复杂性的,并不是思想文化的单独作用力的结果,然而思想文化体系却体现出重大的引导作用。对于中国建筑的传承与发展,不在于模仿其表象,以心理—文化结构的构架来解答建筑,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中国建筑的精髓。

参 考 文 献

- [1]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2] HILLIER B, HASON J.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 [3] 顾孟潮,张在元. 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M]//程友玲. 中国建筑的空間艺术 空間的中国建筑艺术.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4] 李晓东,杨荏善. 中国空间[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 [5] 顾孟潮,张在元. 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M]//沈福煦. 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築表述.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6]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 [7] 曾晓红. 析中西建筑美的尺度[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03(4):81-84.
- [8] 程大利. 中国画的本质、特性、境界和欣赏[N]. 中国艺术报,2011-06-29(5).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patial Form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mentality

LI Yang-wen-zhao¹, LIU Su¹, TANG Jing-wei²

(1.Architecture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China Machinery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on architecture embodies not only the concrete inheritance, such as totem, hierarchy, etc, but also the abstract shaping of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mentality, the latter of which is the key point to tr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ts influence includes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space composition, the directionality of spatial scale and the imaginary space. Rather than the form,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s the composed space, which can be achieved and better understood by employing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mentality to design the modern architecture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style.

Key words: the structure of cultural mentality; the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space composition; directionality of spatial scale; imaginary space

【编辑 吴晓利】

=====

(上接第36页)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DING Lin, GENG Zi-zhen

(School of Busines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employee creativity depends on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knowledge exchange, in which the trust is the keystone. Therefor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especially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LTS)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employee creativity. In order to test the important role of LTS on employee creativity, a study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which leaders and employees from thre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North China were involved,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By using a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not only the employee creativity but also th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latter of which, in return,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Key words: leader's trust in subordinat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creativity; mediating effect

【编辑 王思齐】